

红色地名传承太行精神研究——以山西省长治市红色地名为例

李沁峰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32；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红色文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记录着党的奋斗进程。因此，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不断推进其创新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太行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红色地名作为太行精神的物质载体，不仅记录了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群众在太行山区艰苦奋斗、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通过深入挖掘红色地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太行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红色文化；太行精神；路径机制

DOI：10.69979/3029-2700.25.06.046

1 太行精神与长治市的历史渊源

太行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瑰宝，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孕育而生的精神财富^[2]。1937 年，八路军 129 师进入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砖壁村因成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而得名，其地名与“百团大战”“反扫荡”等战役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在长治地区反击国民党进攻，长治民众为战役提供后勤支持，承担了兵员补充和物资中转任务，部分村庄（如潞城神头岭运输站）被赋予“支前模范村”等称号，进一步强化地名与群众动员的关联。1943 年李顺达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创办全国首个“互助组”，成为“农村改革先锋”，1950 年申纪兰通过劳动竞赛推动“男女干同样的活，记同样的工分”，成为全国最早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农村范例之一^[3]。新中国成立后，八路军总部旧址（王家峪）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988 年建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使武乡县成为红色地标核心区域。

2 红色地名典型案例分析

一曲《在太行山上》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长治市作为太行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承载着丰富的红色历史与地理特色，见证了太行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也成为传承这一精神的重要地理标志。

翻开太行山区“红色地图”，一处处革命遗址和一座座纪念碑犹如红色火炬矗立在老区大地。2021 年 11

月 2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核定公布第一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的通知》公布，第一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 191 处中，长治市有 62 处红色文化遗址入列。2022 年 12 月，山西省民政厅、省委党史研究院、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公布《山西省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及红色地名保护名录》，在 50 个红色地名中，11 处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红色地名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承载着革命历史和民族记忆的宝贵财富。

2.1 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群

据传武乡县因古代有武士在此屯垦定居而得名，历经岁月变迁，这片土地逐渐成为了革命斗争的重要舞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武乡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敌，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抗战的核心指挥枢纽，其历史可追溯至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1939 年 10 月至 1942 年 5 月，八路军总部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将领率领下，三度进驻武乡县，其中王家峪驻扎 11 个月，砖壁村驻扎 263 天，形成了“山沟里的延安”这一独特历史景观。此地地处太行山腹地，凭借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地理优势，构筑起天然军事屏障，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神经中枢”。

在武乡驻扎期间，八路军总部实施了多项重大战略决策：1940 年 7 月在此酝酿的《百团大战预备命令》，拉开了这场参战兵力达 105 个团的大规模战役序幕；砖

壁村作战室内绘制的军事地图上,清晰标注着正太、同蒲、平汉等铁路线的破袭计划,指挥系统在此完成了对 129 师、120 师及晋察冀军区的战役协同。朱德总司令亲手栽种的“红星杨”,树干断面可见五角星状纹理,成为军民同心抗敌的精神象征。总部机关在此创办了华北《新华日报》,组建了鲁迅艺术学校,构建起涵盖军事、政治、文化的立体抗战体系。1988 年,旧址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名录。

2.2 黎城县黄崖洞兵工厂旧址

黎城县黄崖洞兵工厂旧址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首个规模化军事工业基地,其历史可追溯至 1939 年 7 月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腹地的战略布局。在日军实施“囚笼政策”严密封锁的困境下,朱德、彭德怀亲自勘察选址,由左权将军具体指挥建设,利用黄崖洞海拔 1600 米的丹霞地貌天然洞穴群,构筑起占地 10 平方公里的隐蔽军工体系。这座被称作“太行山上的兵工摇篮”的基地,开创了我军“山沟里造枪炮”的军工奇迹。1985 年,黄崖洞兵工厂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如今,遗址内复原的淬火车间仍保留着当年德国产蒸汽动力锤,新建的沉浸式体验馆通过数字技术重现“用鞭炮模拟机枪声诱敌”的经典战术。

2.3 潞城区神头岭伏击战遗址

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第 129 师于 1938 年 3 月 16 日在山西潞城(今潞城区)境内实施的经典山地伏击战^[4]。太原会战后,日军沿邯长公路建立补给线,企图巩固对晋东南的控制。八路军为配合台儿庄战役,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选定神头岭这一地形特殊的古驿道设伏。利用废弃战壕与天然岩洞隐蔽,首创“重叠待机”战术:首轮攻击后故意示弱撤退,待日军收容队进入伏击圈再行二次打击。经 2 小时激战,歼灭日军 1500 余人,缴获骡马 600 余匹及大批武器,摧毁运输卡车 7 辆^[5]。战斗中,八路军工兵连用自制“马尾手榴弹”实施近距离杀伤,炊事员以扁担俘获日军士兵等事迹,成为军民协同作战的传奇。

2.4 平顺县西沟村

平顺县西沟村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东南部,在我国农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西沟村不仅是李顺达

互助组的诞生地,也是申纪兰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起点。

西沟村所在的平顺县是太行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八路军 129 师的重要活动据点,村民积极参与支前工作,为根据地输送粮食、布匹等物资。1943 年,李顺达在此组建太行山区第一个互助组,开创了集体化生产的先河,这一模式后来被推广至全国^[6]。1951 年,李顺达联合申纪兰等村民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典范^[7]。申纪兰在此推动的“男女同工同酬”改革,于 1954 年被写入新中国首部《宪法》,奠定了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法治基础。1980 年,西沟村率先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保留集体林场、果园等公共资产的同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2010 年后,依托太行山生态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建成占地 3.6 平方公里的西沟展览馆群,年接待游客超 15 万人次。

3 红色地名在地方志、民间传说中的体现

在地方志的记载中,红色地名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革命历史的见证。长治市红色地名的地方志记载,以客观史实为基础,构建了革命精神的权威叙事。例如:

黄崖洞:民国《黎城县志》明确标注其地理位置与地形特征,并记载 1941 年八路军在此建立华北最大兵工厂的历史。方志中“崖壁陡峭、易守难攻”的描述,与“黄崖洞保卫战”中军民以少胜多的战役细节相互印证,赋予地名“钢铁屏障”的象征意义。

砖壁村:《武乡县志》详述 1939-1942 年八路军总部驻扎期间的战略部署,记录朱德、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的电文原件内容,使该村从普通地名升华为“华北抗战指挥中枢”的代名词。

西沟村:地方志以编年体形式记载申纪兰带领村民开展合作化运动、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迹,将地名与“劳模精神”深度绑定,成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空间载体。

这类记载通过时间、人物、事件的精准记录,使红色地名成为可追溯、可考证的革命记忆坐标。

在民间传说中,红色地名更是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当地民众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将这些红色地名的故事和传说代代相传,赋予红色地名更丰富的文化隐喻与精神延展。例如:

老爷山:唐代名将尉迟恭驻军的传说,与上党战役

中解放军“夜袭高地”的口述故事交融，衍生出“古战神庇佑正义之师”的新叙事，强化了地名的英雄主义色彩。

洗耳河：尧帝时期隐士许由洗耳拒官的传统典故，被民间附会为八路军“清正拒腐、一心为民”的行为映射，形成跨越千年的道德呼应。

发鸠山：《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神话发源于此，抗战时期衍生出“军民衔石筑工事”“不屈抗敌似精卫”的传说，将神话意象转化为革命毅力的写照。

长治市红色地名通过方志的史实性记载与传说的文化性演绎，实现了革命精神的“双重赋能”。这种叙事模式既确保了历史的真实性，又通过民间想象，以一种动态模式拓展了精神传承的广度。

4 红色地名传承太行精神面临挑战

4.1 历史记忆断层

青年群体对“八路军总部”“黄崖洞兵工厂”等核心地名的认知度不足，调查显示 45 岁以下市民中仅 32% 能准确说出 3 个以上本地红色地名。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部分红色地名所依托的物理空间正面临消失的风险，如旧址损毁、建筑改造等，这进一步加剧了历史记忆的淡化。此外红色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缺乏创新，难以吸引年轻人的兴趣，导致红色地名及其背后的太行精神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承出现断层。

4.2 保护开发失衡

平顺西沟村、武乡王家峪等 20 处遗址存在建筑老化问题，部分地名因乡村合并面临消失风险，如潞城区原“抗大一分校”旧址周边地名标识缺失。同时，一些红色地名核心景区过度商业化，在开发中过度包装，失去了原有的历史韵味和文化内涵，使得游客在参观时难以感受到真实的革命历史氛围。资源利用失衡，保护资金多用于维护知名遗址，一些相对偏远或知名度较低的红色地名则缺乏必要的修缮和保护，导致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逐渐被人遗忘。

4.3 传播效能不足

红色地名的传播渠道相对有限，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媒体和宣传手段，缺乏创新和多元化的传播方式。这导致红色地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受到限制，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太行精神。同时，由于宣传内容的同质化和缺乏深度，难以激发公众对红色地名及其背后故事的

兴趣和共鸣，进一步削弱了传播效能。

4.4 文旅融合薄弱

现有项目多停留在遗址参观层面，如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90% 内容为静态展陈，缺乏“黄崖洞保卫战”实景演绎等深度体验产品。“红色地名+生态旅游”联动不足，红色地名所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和生态资源，但缺乏将红色文化与自然景观有效结合的旅游线路和产品。游客在参观红色景点时，往往只能获得单一的历史文化体验，重要节点未形成主题线路。周边服务设施与红色旅游需求错配，在餐饮、住宿、购物等配套服务跟不上游客的实际需求，导致游客体验不佳，难以形成口碑效应，进一步限制了红色地名在文旅产业中的发展潜力。

5 红色地名传承太行精神对策建议

5.1 抢救性保护工程

建立《长治红色地名保护名录》，对“屯留抗大七分校”等 47 处濒危遗址实施测绘建档，推动《太行红色地名管理条例》地方立法，明确地名变更审批机制。同时，加强对红色地名相关口述历史、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通过数字化手段保存，如建立红色地名故事数据库，开发在线展览、虚拟现实体验项目，让红色记忆“留下来”。

5.2 数字化活化工程

开发“长治红途行”AR 小程序，扫描红色地名对应二维码（地名标牌）等即可观看该地名背后的历史故事和革命场景，如黄崖洞保卫战的激烈战斗、西沟村合作化运动的生动实践等。此外，结合大数据分析，精准推送红色旅游线路和个性化体验项目，如“重走太行抗路”“体验劳模生活日”等，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太行精神的魅力。同时，将红色地名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元素相融合，打造“红色+绿色”“红色+民俗”等多元化旅游产品，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红色地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5.3 教育融合工程

组织编撰《太行山上红色坐标》等相关读物，将红色地名及其背后的革命故事纳入地方教材，让学生在在学习中感悟太行精神的伟大力量。开设“地名守护人”实践课程，邀请学生实地探访红色地名旧址，通过社会实

践、志愿服务等形式，深入了解红色地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激发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培养红色地名传承的小使者。

5.4 文旅提升工程

构建“一核两翼”空间格局，串联武乡八路军文化园—王家峪总部旧址—关家垴战场遗址等遗址形成“八路军抗战文化体验核”，以平顺西沟村、黎城黄崖洞为两翼，分别打造“劳模精神与乡村振兴体验”和“军工摇篮与抗战传奇体验”，实现红色文化与地方特色的深度融合。

加强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民俗文化的结合，推出“红色+绿色生态游”“红色+民俗文化体验游”等特色线路，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红色地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开发地名主题文创，如发行《红色地名邮票册》，收录“刘伯承工厂”等12处特色地标手绘图案，将“黎侯虎”非遗工艺与地名结合设计IP形象。建设红色太行主题民宿群，开发主题餐饮等。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Z].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1.

[2] 段树琴. 太行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D]. 山西师范大学, 2019. DOI: 10. 27287/d. cnki. gsxsu. 2019. 000800.

[3] 任曦, 杨霞. 纪兰精神的形成、内涵与时代价值[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02): 87-92.

[4] 苏伟林. “上党文化”地方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5] 赵丽, 吴志国.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共同作战纪实[J]. 党史博览, 2005, (08): 17-20.

[6] 苏和平. 推进“劳模之乡”全面发展[J]. 中国城市经济, 2006, (03): 53-55.

[7] 渠水秀. 1950-1953年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D]. 山西大学, 2020. DOI: 10. 27284/d. cnki. gsxiu. 2020. 000879.

作者简介：李沁峰（1997.03-），男，汉族，山西吕梁人，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方向：红色文化，区域可持续发展。

第二批太行精神专项研究课题（青年课题），课题名称：革命历史的见证：红色地名传承太行精神研究，课题编号：THJS2024Q10。